

闽都文化

与开放型经济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KO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闽都文化 与开放型经济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HAIKOU CUL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都文化与开放型经济/闽都文化研究会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978-7-5550-0184-3

I.①闽... II.①闽... III.①文化史-福州市-文集②开放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福州市-文集 IV.①K295.71-53②F127.5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8738号

闽都文化与开放型经济

闽都文化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谢 曦

编辑助理: 吴瑶华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仓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6号楼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50-0184-3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闽都文化与开放型经济》编委会

主 任 练知轩

副主任 高 翔 王聪深 汪征鲁 赵麟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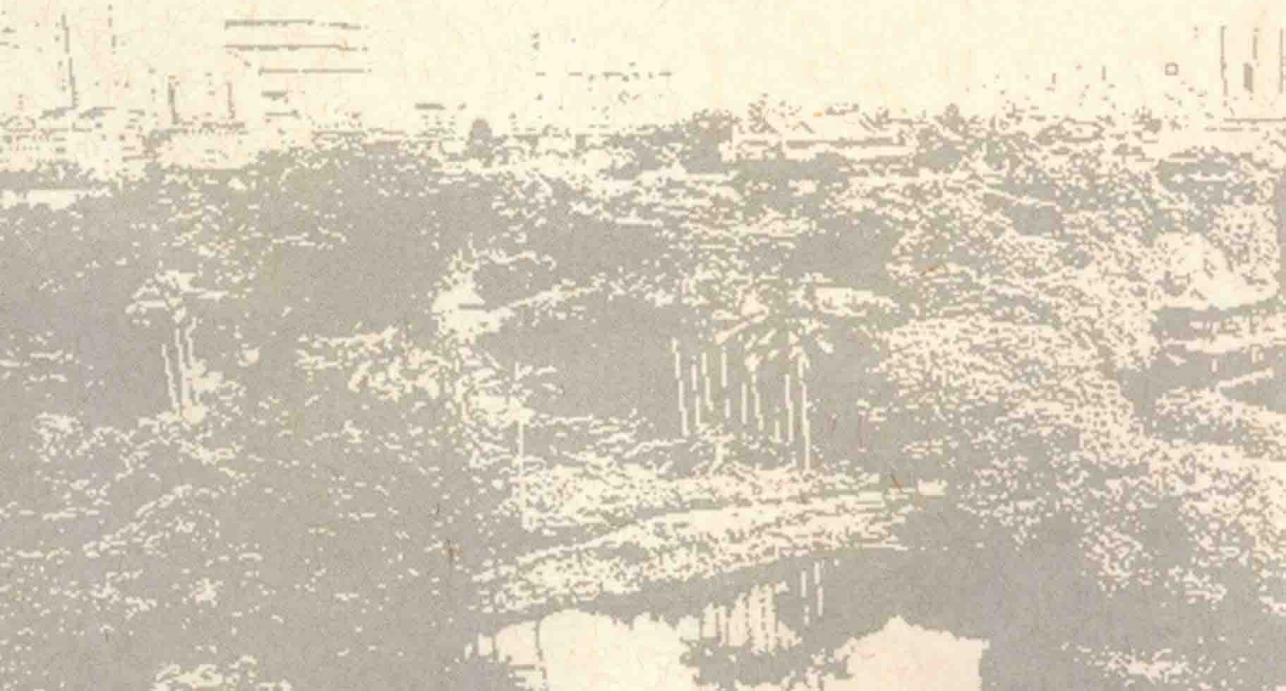
王华南 王聪深 卢为峰 汪征鲁

陈章汉 林 山 赵君尧 赵麟斌

高 翔 黄文山 薛 菁

主 编 高 翔

副主编 黄文山 赵君尧



目 录

清廷的华侨政策调整与陈宝琛的涉侨护侨言行	汪毅夫 (1)
深化闽都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陈祖武 (4)
闽都文化论	李治亭 (7)
三次全球化下的闽都文化及中国现代化	武 力 (19)
林则徐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李红岩 (29)
闽越航海能力与秦汉海洋开发史	王子今 (35)
试论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	
——以明清时期福州与琉球交往为中心	徐 凯 (47)
明代的禁海与开海	毛佩琦 (55)
论明代福州三卫之设与闽都文化之建	彭 勇 (73)
闽都文化孕育出的思想果实	
——以雷铨的理学建树为例	李 帆 (86)
清代科举与闽都文化	李世愉 (94)
闽都文化与晚清思想开放	郑大华 (111)
封闭与开放之间	
——一个英国传教士看开埠初期的福州	李长莉 (130)
郑振铎与闽都文化	陈其泰 (153)
佛教与闽都政治	游 彪 (165)
林纾与新文化	马 勇 (172)
秦汉王朝处理闽越关系的历史经验	卜宪群 (200)
帝国的考量：五口通商前后的福州城	仲伟民 池 翔 (203)
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的一部原稿本之发现	黄兴涛 (215)
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对开放型经济的启示	赵麟斌 (225)



闽都人开启中国近代文化新风	卢美松 (241)
试论闽都文化的形成及其海洋性开放性特征	赵君尧 (249)
闽都文化在琉球	谢必震 (272)
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苏振芳 (285)
林纾与近现代之交的闽都戏剧	邹自振 (294)
林炳章实业思想初探	吴海慧 (304)

清廷的华侨政策调整与陈宝琛的涉侨护侨言行

汪毅夫

清代初年，清廷的华侨政策乃是视华侨为“弃民”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有诏：“久居海外者，该督行文外国，解回正法。”^①雍正五年（1727）又下令“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②1860年以后，清廷的华侨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抛弃其禁止对人民出国谋生、侨居的措施，转而对华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争取、控制和利用的政策。”^③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抄录的“署漳州府海澄县正堂”于清同治十年（1871）“告示”的《示禁碑》，即是清廷华侨政策调整的证物之一。该《示禁碑》文^④就“丐首胆敢欺视外国初回，人地生疏”的华侨之事件，由地方长官（海澄知县奉汀漳龙道公文）出面严禁恶丐劣行。

据我闻见所及，闽都学人陈宝琛于1885~1909年在闽居住期间，有如下涉侨言行：

1. 闽都学人王元稚逝世后，其子王祖谷等8人“衔哀谨述”的《哀启》记：（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省垣大水，视三年尤酷。先严倡募闽灾赈，躬谒陈弢庵太傅之门，吁请总持其事。募赈之函，达各行省并及外洋，先后集得三万余金。函稿皆先严一手经理。”据此可知，此次募赈范围包括了“外洋”之华侨，“总持其事”者是陈宝琛。

2. 王祖谷等人的《哀启》又记：“庚子夏，省垣疫症盛行，复被水灾，罹灾疫者数万人。经陈弢庵太傅函邀，先严赴南洋各岛募赈。时先严年届六十，不惮波涛万里之行，往返五阅月，在新加坡各地募得十余万金，悉汇回由陈太傅转付散赈，救活者无虑数万家。”

查《福建省志》^⑤之《大事志》记：“是年，鼠疫从闽南传到福州，南营有一家大小11口全死，连到他家致唁的亲属也死在其家。”



“庚子”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3.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批准陈宝琛出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

该公司之《暂定章程》规定：“本公司专招华股。凡我华人之侨居外洋各岛者，但查实系华人，即得与股。”该公司之《招股章程》则规定：“本公司专招华股，如有为外国人代购股票，及将股票转售、抵押于外国人者，本公司概不承认。”^①

1906年，陈宝琛亲赴南洋各埠，包括爪哇、息力、槟榔屿、海珠屿、威雷斯、太白腊、吉隆、巴达维亚、茂物、万隆、南齐下吉、加里巴丹、三宝瓏等地，向当地华侨“招募华股”，共募股170余万元。^②

4. 1906年，陈宝琛《舟行南海，日行两山间，苏门答腊东群岛也》有句并注曰：“月午西风吹密箐，分明文岛豸啼声荷属文岛，待华傭最虐，其诱卖者谓之猪仔。近有湖南广西某某皆以诸生罹诸毒苦。”^③

同年，陈宝琛又有句曰：“无田可耕乃到此，时节先垄宁忘怀。积资难贍乡里望，有吏如虎胥如豺！中伤不售恣剽劫，要赎殃及坟中骸。令君见惯厌雀鼠，循例批答谁亲裁？部文宪檄只益怒，上吁无雨空闻雷。”^④

陈宝琛在其诗作里反映了华侨在居住国、在祖国遭遇的欺压，反映了维护华侨正当权益的观念。

附带言之，清代末年成书的《光绪朝东华录》记：“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或许取重贿，或勒令捐资，不得已据情控诉，官不为理。甚至挟资归来，不数月而荡家破产者……”^⑤所记正与陈宝琛反映的状况相一致。

清廷华侨政策的调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表现。在贯彻调整后的华侨政策方面，闽都学人陈宝琛与焉。

注释：

① 《皇朝通典》卷80，刑制。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179页。

② 《皇朝文献通考》卷3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29。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179页。

③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第183页。

④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438~439页。

⑤《福建省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⑥《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1997年10月编印本，第461~462页。

⑦陈贞寿、黄国盛、谢必震：《陈宝琛传》，《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第559页。

⑧陈俱：《试从〈沧趣楼诗集〉析沧趣志人的襟怀》，《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第480页。

⑨陈俱：《试从〈沧趣楼诗集〉析沧趣志人的襟怀》，《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第480页。

⑩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495页。

2012年11月12日中午

〔作者简介〕汪毅夫，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深化闽都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陈祖武

自从闽都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经过福建各地尤其是福州市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闽都文化研究长足大进，业已揭开崭新的历史篇章。继首届文化论坛于2012年初在福州成功举办之后，此次研究会诸位专家北上京城，再兴盛举。深信以之为契机，闽都文化研究必将以健实步履向纵深推进。以下，谨就深化闽都文化研究的可行性提出几点建议，敬请各位专家指教。

开阔视野：从三山到八闽

我所提的第一点建议，叫作开阔视野：从三山到八闽。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和研究闽都文化，要有一个历史的大视野。福州地处闽东平原，东带沧溟，百川丛会，从先秦经汉唐到明清，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由滨海市镇到古国王都，最终成为一省会城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曲折，始终与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化中原文明为我的历史进程同步。与之若形影相随，福州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三山地域文化，到引领八闽风气，成为八闽文化标志的发展过程。显然，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闽都文化，它已经远远逾越三山地域。在闽都文化的历史血脉中，不仅融入了八闽不同地域文化的优秀因子，而且也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优秀因子，从而成为八闽文化的象征和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观察和研究闽都文化，弄清楚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而准确地揭示其历史特质，就必须确立一个历史意识，一个大局意识。要走出三山，放眼八闽，胸怀整个中华大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在八闽乃至中华大地上，姿态万千的地域文化，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互补充，水乳交融，共同汇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

整理文献：传承闽都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要提的第二点建议，是关于文化典籍的整理问题，即整理文献：传承闽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由于地理区位和经济、政治、人文、生态诸多因素的制约，福建开发稍晚。汉晋以降，尤其是李唐一代，伴随中原文化的大规模南播，八闽开发的步伐陡然加快。至天水一朝，昔日“化外蛮荒”倏尔之间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邹鲁”、“文献名郡”。古往今来，闽都文化之能在东海之滨世代传承，不唯嘉惠八闽，而且走出闽中，流布中原大地，扬帆远航，播越五洲四海，其间缘由甚多，殊可过细探寻。倘若究其大要，除却有赖于艰苦奋斗，繁衍生息，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八闽人民，第二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便在于有闽都文化凭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即绵延不绝的八闽文献。

据郑宝谦先生著《福建省旧方志综录》记，自晋代《闽中记》问世，唐宋以还，踵事增华，代有续作，及于明清两代，乃成大盛之势头。诸如明李奎著《闽中稿》、清陈元钟辑《闽中唐宋元明诗文编》、柯辂撰《闽中文献》、王捷南撰《东越献征录》等等，比肩接踵，不胫而走。加以历代儒林、文苑中人结撰之经部诸疏、史部群籍、子部百家、集部诗文辞赋，以及晚清西学东渐而盛行之新学著述，允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八闽文化典籍，是闽中历代先贤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是闽都文化世代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闽都文化生生不息的深邃根源。从实际出发，认真制订规划，精心保护，精心遴选，精心整理，守护和传承这份珍贵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也是深化闽都文化研究必须切实做好的一桩大事。

弘扬闽学：闽都文化生生不息的纽带

我打算提的第三点建议，是关于对闽学人学品格的把握和弘扬问题，叫作弘扬闽学：闽都文化生生不息的纽带。最近，我读到卢美松先生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这是一部讨论福建地域文化



的力作，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拜读之后，深得教益。书中辟出专章，题为《朱熹与闽学》，由资深专家陈遵沂教授执笔，卓然睿识，受教最多。陈先生认为，南宋初朱熹所创立的闽学，是个集理学之大成的学术体系，也是福建地域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完全赞成陈遵沂教授的主张。

闽学是传统儒学在两宋时期自我更新的时代产物，它既是对北宋濂学、洛学、关学的系统总结和创造性发展，也是对数千年中国学术的成功总结，顺应时势，继往开来。由宋元迄明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影响中国社会和学术文化演进数百年。不唯如此，随着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往的展开，闽学走出国门，流播汉字文化圈诸邻邦，程度不等地影响了东亚和南亚诸国学术的发展。

闽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何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对数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人学品格的成功把握和弘扬。儒学以人为论究核心，从个人的修持入手，进而探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个人与天下国家千丝万缕的联系，先人后己，推己及人，最终谋求人类社会的人我一体，和谐发展。

儒学、朱子学、闽学，三位一体，世代传承，洋溢于其间的人学品格，业已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无形纽带。这是一份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闽学的人学品格，无疑是深化闽都文化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大课题。

总结上述三点建议，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以人为本，努力构建闽都文化的传承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使闽都文化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闽都文化论

李治亭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论面积，属于一个中小省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福建也同其他地区一样，形成了本区域丰富而多彩的地域文化，按其文化特点，自成一地域的文化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地区的历史文化学者已展开对本地区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提出“闽都文化”的名称并进行论证，应是福建区域文化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这一文化定位，涉及文化地域的界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内涵的基本定型，以及文化精神的科学概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尚须深入探讨。

实在说，我对闽都文化并无研究，仅就上述提到的几个问题，作一理论的粗浅分析，借此向闽都文化学术同人请教。

一、关于“闽都文化”的地域界定

我国疆域辽阔而广大，各地区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生产生活方式等，千差万别。还有，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与汉民族相比，无论各个方面，皆存在明显差异。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伴随各民族文化的不断变化与积累，逐步形成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所谓“区域文化”，是指一种文化所覆盖的地区。进一步说，一种文化在一个地区生成、发展，最终形成一种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文化生态。这就是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文化，即可称为区域文化。

应当指出，区域或地区文化并非一定指现今行政区域来划分的，关键是同一的文化形态是否存在于同一地域，此即划分或界定区域文化的



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客观依据。例如，东北地区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区。确定文化区域就不能按三个省分为三个文化区域。因为历史上的东北地区——清代以来，并无明确的行政区划，浑然一体，故形成同一的文化，包括习俗、习惯、饮食、禁忌等等，几无差异。在长期的各民族互动、互为影响中，东北地区的文化业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据此，可知东北地区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亦即文化共同体。至清代，虽在东北分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等三个行政区，亦相当内地设省，却也无法分割为三个区域文化，应是同一的东北地域文化。在其他地区，如山西与陕西、湖南与湖北，视同一个文化系统；山东、四川、西藏等，亦各自形成本地区的文化。以此类推，其他省份，或一省或跨省皆为地区文化。

现在就来讨论闽都文化的地域界定。

福建地方文化学者已做过研究，认为“闽都文化是以福州城区为中心的都会文化”（见《闽都文化概论》第1页），很清楚，闽都文化的地域范围，仅限于“福州城区”，给其文化定位为“都会文化”，所谓“都会”，在今则指为一地区的中心城市。

将闽都文化的地域限定在福州城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闽都——福州与“八闽”是什么关系？亦即“都会”福州与福建全省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就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果福州被划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或称为一个文化区域，那么，“八闽”的文化区域又该如何划分呢？迄今为止，在我国各个区域文化中，还没有一种文化被界定在一个城市。若以一个中心城市定为一种文化地域，这在我国城镇中比比皆是。如洛阳、西安、开封、北京、南京等城，都曾是帝王之都，尤其有理由定位某种文化。其结果，一是割裂了中心城市即都会文化与本地区同一文化的整体性，二是从文化的划分上也失去理论依据，不符合文化区域的原则。就实际文化状况而言，整个福建地区的文化与“闽都文化”是同根同源同质，是不可分的。“闽都文化”无论多么丰富，也只能是福建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将“闽都文化”独立出来，就成了一个都市文化，这在福建文化中没有普遍意义。

因此，把“闽都文化”定位在“福州城区”，显然脱离了福建历史文化实际。事实证明，无论研究历史，研究文化，都须树立全局观、整体观念，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历史，揭示历史与文化的真相。

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即文化名称，同样不容忽略。文化名称无疑是不同类型文化相区别的鲜明标志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地域文化中，诸如晋文化（山西）、齐鲁文化（山东）、楚文化（湖北）、蜀文化（四川）、燕赵文化（河北）、西域文化（新疆）、滇文化（云南）、吴越文化（江苏、浙江）、关东文化（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等，无不显示出各自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换言之，文化名称之不同，恰恰是标明文化之不同。

那么，福建地区文化名称该如何命名？“闽都文化”名称是否合适？首先，须知任何一种文化的命名，皆来源有据，不可随心所欲，随便给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我们通过对上述各个区域文化名称起源稍作分析，便认识到：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地理与当代地理三者基本吻合，一句话，古今贯通，此其一；其二，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衍化、流变，确已形成与其他地区不相同的文化；其三，对本地区的文化认同感，经世代流传，已形成共同的文化观念，约定俗成，为当地广大群众所接受。

上列多种文化名称，如鲁、晋、楚、吴、越、蜀、关东等等，原为古称，又与今地相吻合。这些古名称，世代流传，确已约定俗成；故用为本地区的文化名称，是再合适不过了。

以此原则来推定福建地区文化名称，也就不难。先说“闽都文化”这个名称。“闽都”源于西汉初封闽越王，在今福州地段为王都。其后，屡经变迁，终成“八闽”之格局，福州为“八闽”之首，不是王都，却仍起到王都的作用。无疑，“闽”已成为福建的代名称，“闽都”则专指福州。这已是约定俗成，妇孺皆知。“闽都文化”专指福州地区的文化，确属名符其实，也无可非议。但若以此称，指为福建整个地区的文化，恐怕就会是名不符实了。这就有必要再给福建地区的文化重新命名。

福建地区的文化名称，取用不难。据史料记载，商周之际，已设为“七闽”、“闽方国”等，至汉初始有“闽越王”，自此才有“闽都”之说。这里，有“闽都”与“闽越”两说，稍作比较，“闽都”涵盖不了全福建，唯“闽越”代称福建，可谓恰如其分！这一文化名称之来，同上列几种文化名称的起用，其道理同一。如“晋文化”之“晋”，来自周初的封晋国；“鲁文化”之“鲁”，亦为周初的封鲁国，封地在今山东，故山东别称“鲁”。至于福建，今之区划，与古之“八闽”基本相



合，称福建为“闽越”或简称为“闽”均可。其文化即称“闽”或“闽越文化”均可。

福建学术界给福州文化定名，未给全省文化命名，是否合适呢？

我的意见，只论“闽都文化”，而不论“闽越文化”似嫌不妥。因为“闽都文化”不过是一城一地之文化，不能涵盖整个地区的闽越文化，反过来说，闽都文化只能是闽越文化的一部分。

试想：2000年前，“闽都”即福州有多大？1000年前、500年前，福州肯定又有新发展。就人口来说，不过十几万，或二三十万，新中国成立前，福州城区人口还不足百万。当然，城区的规模也很有限。以其地处海边之一隅，境内多山，耕地少，地贫瘠，加之交通不便，人口增长不快，城区的规模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在城区发展起来的文化，与其他中小城，或与广大农村文化相比，也只能是福建地区文化的局部文化，代替不了境内的其他文化。显而易见，所谓“闽都文化”孤立地存在，只是其中的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

只研究一个城区的文化，而忽略全省区的整体文化，不能不是“闽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二、闽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从人类自身的发展，到社会的演进；从中国历史的发端，到当代，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以几千年、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计的长过程中，很自然地形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正确划分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各个阶段，是我们认识历史并给予科学解读的一个基本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舍此，就会误入歧途。

同样，一种文化从其萌芽，到形成，再发展，再变化，也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漫长过程，必然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一阶段的文化内容。研究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准确地理清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历史的发展相吻合，才能真正揭示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真相，从中得出文化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至此，也就完成了文化研究的目的。

写了以上的话，意在说明研究历史、研究文化分清不同的发展阶段非常重要。历史并非是凝固而不变，恰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间断地变化。分不清阶段，或者干脆不去分析阶段，历史或文化真的就变

成凝固而静止了，所列历史与文化，不过是分不清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而已。

现在，就来讨论闽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本来应当讨论的是“闽越文化”即福建省区整体文化的发展阶段，但福建学者提出的文化仍是“闽都文化”，所以，“闽越文化”姑置不论，就针对“闽都文化”来论证其发展阶段。

闽都文化研究者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著述，似乎不那么看重文化的发展阶段，只是偶然提到哪个朝代、时期闽都文化状况。没有阐明闽都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文化内涵与特色，就会产生一个不明的后果：闽都文化是从何而来的？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每个不同阶段的文化有何差别？如此等等。可见前面的分析，符合闽都文化的历史实际。

根据“闽都文化”学者提供的史料，闽都文化从其产生以后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大体如下：

首先，也就是闽都文化的起源阶段。闽都文化学者把它定在 5000 多年前出现的昙石山文化时期。按考古学上的规定，5000 多年前，应属新石器时期，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已临近“国家”的大门，或称为人类文明的前夜。昙石山文化发展到什么水平？其文化特征是什么？可惜，没有作系统的说明。至于在昙石山文化前，是否有原始人类？有否考古发现？仍是闽都文化研究的空白。主要是昙石山文化，可以肯定地说，它对后世文化必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是福建地区也是福州城区文化的源头。这个问题讲不清，对其后的文化也难以说得明白，尤其要影响到对闽都文化的定位。

第二阶段，为闽越文化初步形成时期，这一阶段，约从春秋战国之交，到两汉王朝统治时期，总共为 500 余年，初步形成了闽越人创造的本土文化。这一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战国末期，南方大国灭掉越国，其国之越族人大量向南迁移，进入今福建地区，与当地土著闽族人相融合，遂形成闽越族。这时期，还没有发生汉人大量移入的问题，不言而喻，其文化也不会受到汉文化的浸润，故其文化仍保持着原生态，是名符其实的闽越土著文化。现今已在福州、武夷山等处发现了丰富的闽越人的文化遗存，证明闽越人分布甚广，文化创造也相当丰富。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闽越文化的初期状态。